

罗家伦评传

张晓京 著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人民出版社

K825.4/99

2008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张晓京 著

罗家伦评传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鲁 静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张晓京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 - 7 - 01 - 006867 - 1

I . 近… II . 张… III . 罗家伦(1897 - 1969) - 评传

IV .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662 号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JINDAI ZHONGGUO DE QILUREN

——罗家伦评传

张晓京 著

人 人 人 人 人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76 千字 印张:11.75

ISBN 978 - 7 - 01 - 006867 - 1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

张晓京，女，1967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副研究员。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30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编或合著），曾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3项，北京市市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

回到大历史的“现场”

——为张晓京博士《罗家伦评传》序

在五四运动史的学术研究领域，“五四”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群体，在“五四”以后，在现代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剧烈“分化”，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毛泽东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①。这里，集中说的是“形式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揭示的是五四运动史发展的一个大潮流、大趋势。我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时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中，对于《国民》社和《新潮》社这两个“在‘五四’前夕同时成立，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两大社团”进行分析时，也曾经讲过：“当时新文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31—832 页。

2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化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但是《新潮》并没有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以及“它发展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偏向,坚持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了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的错误倾向,“在‘五四’以后,《新潮》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就迅速地向右转了。”^①那么,“五四”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群体,在“五四”以后,在现代中国大变革时代“向左转”、“向右转”和“走中间道路”的剧烈“分化”,其背后的驱动力、其发展轨迹、其深远影响究竟是什么?在当代中国学界,其关注度一直是不够的,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寥寥。

我从正式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带博士研究生,迄今已经整整二十年。2001年以前,是在中共党史系招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2001年以后,在国际关系学院招收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但是,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没有变,都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生源也比较集中和稳定,主体就是有志于此的“教书匠”,没有所谓的“官博”或“商博”,毕业后大多数也都回到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继续从事历史学或政治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都已经或正在成为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有了各自的学术建树。这一直是我感到非常快慰的事——带出了一支“甘坐冷板凳”的学术队伍。

由于我的学术生涯,有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段是和五四运动史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史是我花费心血最多,同时也自觉有所心得的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带博士研究生,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薪火有所传承”,希望有人能够在五四运动史这一块学术沃土上继续耕耘——尤其是在尚未厚植的“荒地”——“五四”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群体研究领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当初,刚刚入学的张

^①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227页。

晓京和我讨论如何择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提出了以《新潮》社的“双子星”——傅斯年和罗家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设想,我非常赞同。此后,她选取了前期成果和研究基础都比较薄弱因而研究空间也就比较宽阔的罗家伦为对象,我是支持的。当然,隐隐是有所担心的。

无论是在“五四”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群体中,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人物中,罗家伦都是一个在现代中国大变革时代“文人政治化”或“政治化文人”的典型。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以一本《新潮》和一纸《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笔写出五四潮”而名噪一时,在出国游学六年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国被“御用”进入蒋家王朝和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建制内,长期“帮忙”或“帮闲”。虽然,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教育领域(如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和历史研究领域(如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度过的,虽然他也时时标榜自己“不能忘情于学术”的“教授”和“学者”的身份,但是,实际上早已经不是现代意义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中国内地学界过去对于罗家伦“五四”以后“向右转”的“政治定性”,也正是从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关于罗家伦这个历史人物的真正的学术研究有“禁区”、有“盲区”,有“简单化”和“边缘化”的偏向。迄今为止,甚至没有一部对于罗家伦政治生涯和思想脉络以学术话语进行全面、深入和系统地梳理和阐释的学术专著。那么,在当下“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中,在罗家伦这个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何突破传统的“道德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线性思维,在前期成果非常薄弱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正其谬,弥其缺,是一个有比较大难度的研究课题。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作者历时六年完成的逾二十万字的博士学

位论文《穿过历史的迷雾——关于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学术梳理与阐释》(正式出版时定名为《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还是比较好好地体现了我们一起讨论过的选题设计初衷,为罗家伦这个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领域,奉献了一部有新意和创见因而也就有了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研究著作。

通览全篇,我觉得有几个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史料比较丰富。罗家伦的一生,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两个大的时间段,经历复杂,几度起伏,史料散落在海峡两岸,收集、鉴别、整理和利用的工作量比较大。作者尽其所能,将目前可以见到的海内外关于罗家伦研究的中文史料,基本上都加以过滤和利用,使这部历史学著作,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所论均“持之有据”,有说服力,有比较强的历史的厚重感。尤其是关于罗家伦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罗家伦与他的六年海外“求学问之路”、罗家伦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思想三章,分析到位,史论结合得很“出彩”。这也是所有参加她博士学位论文评议和答辩的老师都表示满意的地方。在学界“浮躁”之气日益弥漫的当下,这种“耐得住孤独和寂寞”而潜心钻研的治学精神是非常值得嘉许的。

第二,视野比较开阔,理论分析框架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就罗家伦的一生而言,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他的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他的思想变化轨迹甚至是心态变化曲线都显得“平淡”而“单调”,研究中容易出现“脸谱化”的偏向。作者独辟蹊径,将罗家伦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或“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个案,探讨其在“两难”困境中挣扎和“在歧路”上徘徊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的“戏剧化冲突”,努力揭示“五四”知识分子和“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剧烈“分化”的历史必然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原创性的学术探索是有积极意

义的。

第三,作者的文字素养和文字驾驭能力比较突出。整部著作在明晰的“问题意识”驱动下,从基本结构的谋篇布局和一个个专题的条分缕析,到主要学术观点的提炼和具体措辞的推敲,都很见功力。干净、流畅、大气,可读性强。这也是所有参加她博士学位论文评议和答辩的老师都表示印象深刻的地方。

当然,由于作者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期间还肩负着学校繁重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从寒暑假和“八小时以外”挤出来的时间,论著的一些草匆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如罗家伦在台湾地区的部分与在中国内地部分的比重有失衡之感,显得比较简单。另外,关于罗家伦作为“体制内知识分子”或“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个案之“两难”境遇的分析,个别地方个人的主观色彩过重,有“矫枉过正”之嫌,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该论著作为作者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入门之作”,起点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愿意向各位同行、各位读者郑重推荐这部新作。

彭明

2008年1月

目 录

回到大历史的“现场”	彭明(1)
引言——回到“现场”	(1)
第一章 “引领时代风潮”	(15)
——罗家伦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	
一、“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	(16)
——罗家伦童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时代的 学校教育	
二、“今日之世界新潮”的“弄潮儿”	(22)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罗家伦与“新潮社”	
三、“一笔写出五四潮”	(55)
——罗家伦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第二章 “国难一时未已,当储学以救民族的沉沦”	(85)
——罗家伦与他六年的海外“求学问之路”	
一、“关了罗马史,翻开思想书”	(86)
——罗家伦的六年美欧游学生活	

二、“为学术而学术”?	(96)
——罗家伦美欧游学期间的“学术的兴趣”	
三、“对于国家辞不了的义务”	(105)
——罗家伦美欧游学期间的“社会的兴趣”	
第三章 “教育救国”	(120)
——罗家伦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思想	
一、“党务教育”的“正规化”、“学术化”	(121)
——罗家伦与中央政治学校	
二、“新清华”的“学术独立”	(130)
——罗家伦与国立清华大学	
三、建设“复兴民族文化的大本营”	(162)
——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四、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和塑造“强者”的“新人 生观”	(200)
——罗家伦的“大学之道”和教育思想	
第四章 “闲职”不“闲”	(248)
——罗家伦的西南、西北“宣抚”和他的“新边政观”、 “新民族观”	
一、“滇黔寄兴”	(249)
——罗家伦的西南边疆考察	
二、“经营趁早”!	(255)
——罗家伦的西北边疆考察	
三、“新疆——中华民族的屏障”	(266)

——罗家伦与新疆省监察区监察使一职	
四、“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民族是国家的民族”	(282)
——罗家伦的“新民族观”	
第五章 “悲惨的光荣”.....	(292)
——罗家伦与国民党政权和印度政府的“建交”和“断交”	
一、“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驻在国国旗的形态”	(293)
——罗家伦出使印度	
二、“唯有苦撑，方是生路”	(299)
——罗家伦与印度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断交”“撤馆”	
三、“不是弱国无外交，乃是腐败国无外交”	(303)
——罗家伦的“大国外交”观	
第六章 “痛定思痛”.....	(310)
——罗家伦在台湾	
一、“修史不成编”	(311)
——罗家伦与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	
二、“为中国写一部科学的近代史”	(323)
——罗家伦的历史学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兴趣”	
三、“自由中国”之梦	(332)
——罗家伦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最后“抵抗”	
结语——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体制内”和	
“体制化”知识分子.....	(344)
一、罗家伦的“救亡图存”和为“党国”服务的民族主义	

情结	(345)
二、罗家伦的“士为知己者死”情结	(350)
主要参考文献	(354)
后记	(365)

引言——回到“现场”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或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以传统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意识形态思维审视,一个曾经被闻一多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①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然是“盖棺论定”,夫复何言!除了在学生时代由于一度的“特立独行”而闪烁过的“自由主义”之光,一直“苟且”“入世”的罗家伦作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党化教育”的主要实践者,始终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建制内“帮忙”或“帮闲”,一直被认定为自觉“反共反人民”而丧失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御用文人”^②形象,因此也就自然而然丧失了其在近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应有位置。新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再认识,有了对罗家伦的前辈——胡适“双重人格”的新解读,对罗家伦的同辈——傅斯年“双重人格”的新解读,甚至有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类”——陈布雷“两难”悲剧的新解读,但是,却鲜有对同样具有“双

^① 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0 页。

^②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1 页。

重人格”的罗家伦的“回眸一瞥”。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南昌。18岁就读上海复旦公学,21岁进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1919年1月,与傅斯年、徐彦之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名重一时,并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秋赴美国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修历史与哲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1926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月余即加入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深得蒋介石器重。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时年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1930年5月,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武汉,年底被蒋介石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1932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1年9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其后,受蒋介石的委派率考察团赴西南、西北等边疆各省考察党务及经济建设。1943年又受命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五省区考察。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馆”降旗撤馆,罗家伦即返回台湾。回台湾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革命文献》等大型文献资料丛书。1969年病逝于台北。

在中国内地的学术界,长期以来,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标签

化”、“符号化”了的“负面”政治人物。不仅仅是在坊间，学人们论及罗家伦，一般也都是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视角来褒贬臧否。而不幸的是，虽然也一直自命为“文化人”，也一直苦心维系着近代知识分子的那份“清高”，但是，“两难”困境中的罗家伦，终其一生也没有和现实政治脱开干系。由于罗家伦成名以后即“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而且“至死不渝”，所以，政治“帮凶”的地位和形象焉能得脱？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后，学术界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逐步摈弃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影响，开始逐步将“政治宣传”、“政治批判”与“学术研究”的界限严格区别开来，开始逐步探索以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话语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活跃在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左的”、“右的”或“中间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罗家伦依然不是大家感兴趣或思想兴奋的“焦点”或“热点”。一方面，相对于学人们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罗家伦的前辈——胡适以及罗家伦的同辈——傅斯年的研究热度而言，罗家伦依然是一个很“冷”的选题。另一方面，相对于学人们对那些被“旧体制”所同化了的所谓“御用文人”的代表，或曰蒋介石的“幕僚”如陈布雷、如戴季陶、如陶希圣等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的研究而言，罗家伦依然处于“边缘”，从来没有“中心”过。此一“反常”现象，颇耐人寻味。

不讳言，在选择历史人物研究的主体方面，“讨巧”的方法是“走极端”。那些道德判断或大忠大奸、或大善大恶，那些历史命运或大开大阖、或大起大落，思想、性格变化曲线复杂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学术研究的空间和自由度比较大，容易引起学人们的学术研究兴趣，容易引起学人们的共鸣而寄怀遣情，激扬文字，这样的研究成果

也容易产生所谓的“轰动性”效应。在 20 世纪的中国,这类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如毛泽东如蒋介石,如鲁迅如胡适,都因为其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中心位置和特殊重要性,因为其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承载的“巨量信息”而吸引了一批批学人的学术关照。对于这一类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感”的历史人物,无论是宏观、中观、微观视角的介入,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梳理,研究对象生平与思想的“鲜活性”、“丰富性”和“厚重感”,往往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赋予了学人们研究成果的“鲜活性”、“丰富性”和“厚重感”。即便是言人人殊或仁智互见,也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聚光灯下”的具有“争议性”的“中心”议题。说白了,就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而言,都会让人感觉“有意思”。

但是,与那些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感”的“有意思”的历史人物相比,除了在学生时代、在“五四”运动中一度的“个性张扬”的“弄潮儿”外,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罗家伦基本上没有让灯光“聚焦”而“万众瞩目”的表现机会,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所标榜的“个性内敛”,“为人低调而不事张扬”,而主要是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在自己的政治发展中过早地“站了队”,并且是“站错了队”,始终不悔地“站错了队”。从 1920 年代下半期开始,罗家伦的政治生命就已经与反动的“蒋家王朝”“自觉地”相交相融,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死心塌地”地为旧的统治阶级服务,而且还是那么“融洽”和“默契”,没有反复,没有冲突。所以,在中国内地学术界的眼中,尤其是“意识形态挂帅”时代的中国内地学术界的眼中,一个已经在政治上“定性”了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螺丝钉”,能有多少“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是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即使是在一度对民国人物评价“矫枉过正”的时期,关于罗家伦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是“政治禁区”的情